

港版傳記對內地文化的影響

• 裴毅然

一 香港文化精華在傳記

2005年初，筆者得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資助，前往中大訪學一月。猶鄉下人進城，僅僅中大圖書館與服務中心資料室，就令筆者生發「此間樂」，並很快領悟：得風雲際會，香港文化精華在傳記。此後，筆者費盡周折索購港版傳記三四十餘種，如《龔楚將軍回憶錄》和《鬥爭十八年》^①。如果說香港對中國大陸的經濟價值在於轉口貿易，對內地學人而言，香港的價值則在於轉口文化，尤其是轉口傳記。文化幅射多元多維，潤物細無聲。有時心海浮問：假如失去香港，中國將會怎樣？

即將出版的拙著《延安一代士林》（開放出版社），共有2,400餘條註釋，三分之一出自港版傳記。可以說，港版傳記已成各路當代國史研究者不可或缺的资料來源。

港版傳記的高度自然是相對於大陸傳記的低矮。因為「必須守紀」，不少大陸傳記、回憶錄只寫到1949年，

好像傳主只活至斯年，如黃藥眠自傳《動蕩：我所經歷的半個世紀》和胡績偉自傳《青春歲月：胡績偉自述》^②。也有詳寫1949年以前、略寫其後的，如徐向前的《歷史的回顧》^③。國人咸知：1949年以前好寫，可以直寫；1949年後難寫，不讓直寫。十二歲入延安的「八路軍公主」灰娃，近年出了大陸與港版兩個版本自傳，唯一區別就是大陸版刪去「六四」一章^④。

港版傳記依託「自由港」，收穫了最最重要的真實。自由不僅為香港經濟繁榮打下堅實地基，也使香港為國家保留了一脈真實的當代史。胡適有言：「傳記文學寫得好，必須能夠沒有忌諱；忌諱太多，顧慮太多，就沒有法子寫可靠的生動的傳記了。」^⑤這當然是常識，但對內地來說，卻是「同志仍須努力」的任務。港版傳記還為兩岸矗立起歷史與文學嫁接的最高規尺，做到胡適所說的「給史家做材料，給文學開生路」^⑥。曹聚仁的《魯迅評傳》（1956年初版），至今對大陸魯研界仍有領先度，成為大陸現代文

如果說香港對中國大陸的經濟價值在於轉口貿易，對內地學人而言，香港的價值則在於轉口文化，尤其是轉口傳記。文化幅射多元多維，潤物細無聲。有時心海浮問：假如失去香港，中國將會怎樣？

學研究者「告別魯迅」的起點。曹著未將魯迅寫成神，直書魯迅因不甘寂寞而居滬，又說「魯迅對於政治集團生活，也不一定十分感興趣的呢！」^⑦僅此兩句，就難為當時大陸「言論尺度」所容納。韓文甫（寒山碧）的《鄧小平傳》^⑧，且不說「永不翻案」、「六四」等敏感點，單單選題，大陸誰人敢寫？中宣部長都不敢接的活兒，誰敢保證寫出來的鄧小平合乎「中央要求」？就是有人敢寫，哪家出版社敢接？

直到1990年代，北京還在開會研討「紀實文學能否虛構？」^⑨，最基本的傳記寫作原則尚需研討，盤旋層次之低，整體水準可以想見。

1980年代以後，紅色恐怖稍退，大陸傳記漸熱，但無論敘事的真實性、論說的自由性、分析的深刻性，均遠遜於港版傳記。1999年召開的首屆香港傳記文學學術研討會上，葉永烈承認其傳記作品的一大缺陷是「述而不論」，因為一「論」就完——通不過審查。他五十多萬字的《陳伯達傳》可出版，但萬餘字的〈論「陳伯達現象」〉迭遭麻煩^⑩。

不僅龔楚、陳伯達、王力、聶元梓、徐景賢、于會泳、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緞羽者在香港出自傳；高崗、陳修良、金敬邁等冤屈者的傳記，也只能呼吸於港，一傾冤屈，吐訴真相；「兩頭真」人物李銳、胡績偉、許家屯、宗鳳鳴、何方等，他們的回憶錄、文集也只能在香港出版；甚至鄧力群、李鵬等享有「社會主義真自由」的中共大佬，也要到「資本主義假民主」的香港去留下真聲。中共要角每出一本港版回憶錄，北京就會抖擻一下，羅湖、皇崗等海關就查得特別緊。港版高崗傳記《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⑪2008年出版後，中宣部自然會一陣緊張：裏面

會有哪些「不宜」？有趣的是，中南海一邊查禁，一邊對港版傳記興味很濃，高官趨之若鶩的情形時有耳聞。

筆者若非讀了一些港版傳記，思想有可能仍錮鐵屋，不可能走到今天的「改革開放」，不會走得距離「正確觀點」愈來愈遠。資訊不僅決定思維品質，也決定判斷的層次。失去異質思維牽引，大陸人民將無法走出同質思維的漩渦。香港文化價值，靜靜矗立，下自成蹊。

二 為內地悄開天窗

由於資訊鎖閉，以及最近十餘年每年耗費數百億的封網金盾工程，績效顯著，實踐出「真知」：要讓人民聽話，最好只能讓他們聽到一種聲音；紅衛兵一代若無機會出境，一般四十五歲左右才有可能接觸「反動資訊」。至於當今大陸青年，最隔膜的历史竟是當代史！筆者執教高校二十八年，近十餘年接觸的學生，約50%的大學生不知道「六四」，60%不知道劉少奇、林彪（包括筆者之子），甚至不知道「四人幫」。就是知道，也只是一團星雲般名詞。對上一代是常識，對下一代已成知識。筆者所指導的八屆碩士生，無一知道大饑荒，更不知道暴力土改和鎮反肅反，即便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對他們也都相當遙遠了。一位碩士生在接觸寒山碧先生前，全然不知當年百萬粵人游海逃港。另一位碩士生翻閱宋永毅主編的港版《文革大屠殺》^⑫，才幾十頁，驚恐萬分，不敢再讀下去了。作為導師的筆者被迫反思：讓她接觸這種「反動書」，是不是太殘酷、傷害純潔心靈，影響她的青春幸福度？

筆者若非讀了一些港版傳記，思想有可能仍錮鐵屋，不可能走到今天的「改革開放」，不會走得距離「正確觀點」愈來愈遠。資訊不僅決定思維品質，也決定判斷的層次。

由於「淡化」政策，國人無法借助傳媒便捷了解當代史，1950至70年代仍被捏塑成「幸福的解放後」。年輕一代怎會想到「偉大的毛澤東時代」竟比「萬惡的舊社會」還恐怖？中國歷史上的最黑暗時期——大饑荒三年餓死四千餘萬人，加上文革折騰死兩千萬人，是澳洲全國人口的三倍。

遮罩最近的歷史，當然意在不讓人察看現實的來歷；「淡化」的地毯之下，壓着「不宜細看」的醜陋。如此這般，肉胎真身的港版傳記不僅向大陸遙開天窗，提供多面向的當代史，也搶救了一大批重要史料。馮蘭瑞的《別有人間行路難：1980年代前後中國思想理論風雲及其他》，內有胡喬木1976年3月2日向毛澤東揭發鄧小平的信^⑩。僅憑此信，即可說明胡的政治品格與思想認識。內地哪家出版社敢「放行」此信？再如《邱會作回憶錄》提供了羅瑞卿、賀龍之所以被打倒的真實原因（羅確有野心、賀也確有小動作），而起意打倒羅瑞卿的是毛澤東而非林彪^⑪。各種中共黨史至多提供結果（有時連結果都按需要裁剪），港版邱氏回憶錄卻提供了形成「結果」的原因。大陸版中共大佬回憶錄則因無法實話實說，史料價值大打折扣，有的甚至只能成為「反面教材」——證明一個時代的荒謬。

1990年代以前，國人雖然明知身居「鐵屋」，但卻不知外面的世界究竟如何精彩。民主自由究為何物？畢竟缺乏實際感知。思想解放的前提是必須具備一定異質資訊，「鐵屋居民」的頭腦裏既然除了「黨的聲音」再無其他住客，也就拿不出質疑「偉光正」的力據。不少「兩頭真」人物的回憶錄，對大饑荒、文革武鬥等宏觀資訊一無記述，箝制了後人對毛時代罪惡的認識，更不用說對赤潮的整體反思。吳

法憲、李作鵬、邱會作至死都以正牌共產主義者自傲，以撇清與「九·一三」事件（林彪事件）的關係為晚年最高目的。聶元梓、蒯大富至今仍認為毛發動文革目的純正——反對黨內特權階層，不同意全盤否定文革。蒯將許世友在天安門城樓向自己和韓愛晶行軍禮，視為人生的最精彩一筆^⑫。

筆者閱讀的港版傳記中，值得推薦的有包天笑《鉤影樓回憶錄》、張國燾《我的回憶》、王凡西《雙山回憶錄》，屬於珍稀資料性傳記；許家屯《許家屯香港回憶錄》、康正果《我的反動自述，1949-2003》、賈植芳《獄裏獄外》、張元勳《北大一九五七》、何方《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何方自述》、李南央《我有這樣一個母親》，均為「偉大毛時代」及「開明鄧時代」的真實投影；譚蟬雪《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記實》的爆炸性資料，使之成為右派傳記中的翹楚之作，一枚將反右釘上歷史恥辱柱的滴血之釘^⑬；曹聚仁《魯迅評傳》和寒山碧《鄧小平傳》，各具獨特的精彩。

台灣版傳記中亦不乏優秀之作：陸鏗《陸鏗回憶與懺悔錄》、巫寧坤《一滴淚》、《胡適口述自傳》、《張學良口述歷史》^⑭，功力深厚，史味精濃。

三 港版傳記的資料性

在筆者延安一代研究中，港版傳記功莫大焉，甚至具有啟蒙作用。從賈植芳《獄裏獄外》，筆者得知1932年北平師範大學社科系舉辦數月講座，侯外廬、陶希聖、馬哲民等紅色教授公開講授馬克思主義，課堂上徵訂王亞南翻譯的《資本論》（*Kapital*）^⑮。葉永烈的《江青畫傳》告訴我們，1934年春，

遮罩最近的歷史，當然意在不讓人察看現實的來歷；「淡化」的地毯之下，壓着「不宜細看」的醜陋。如此這般，肉胎真身的港版傳記不僅向大陸遙開天窗，提供多面向的當代史，也搶救了一大批重要史料。

黃敬(俞啟威)在中國大學旁聽李達《資本論》課程^⑨。這些細節使筆者對中共宣傳的馬列主義當年如何受壓有了「本質認識」，有能力擺脫從紅色影片與《紅旗飄飄》叢刊中得到的「歷史」。

此外，港版傳記有些細節令筆者大驚。《龔楚將軍回憶錄》記述，1922年三十六歲滇軍旅長朱德倦勤離職，攜六萬大洋與四位姨太太抵滬，欲過神仙日子。偏偏朱德接觸赤士，迷上馬列，決定留德參加革命。中共實行一夫一妻制，朱德召開家庭圓桌會議，宣布只留一位太太，由太太們自行決定去留。此時，他尚存五萬多元，兩萬自己留德，餘分四份，每份八千，一人一份。四位太太搶着要留，爭鬧起來，只得抽籤，最美麗的四姨太太賀芝華抽中，其餘三位各領八千大洋「遣散」^⑩。因是孤證，筆者怕龔楚要噱嘩眾，不便遽信不敢引用，但心目中忠厚敦實的朱老總形象則轟然倒地。再據朱德井岡山衛士李作鵬的回憶錄，朱德從德國買了四支手提衝鋒槍及一支二十響駁殼槍，財力之厚，得到佐證^⑪。

港版傳記在臧否人物上敢於品評。如有人揭發文革中從維熙在京郊團河勞改農場時，「張恩忠卻鄙夷他，說他奉上欺下，自私圓滑。」^⑫大陸傳記中絕難讀到這樣的點名批評，編輯早替你「把關」了。嚴格的審讀制度之下，無論自傳還是評傳，作家除了對自己對傳主負責，還必須「對黨負責」，「不利於穩定不利於團結」的內容必須刪去。如楊憲益退黨、季羨林慰問「八九」廣場學生等，一律刪隱；這些史實，只能從港版書刊中獲知。再如賀龍主持中央軍委工作期間，拉攏其他山頭的軍幹，說過：「茅台酒勝過黨性。」^⑬賀老總的這種話，在大陸聽得到嗎？再如李作鵬對林彪的讚評^⑭：

我看林彪不屈從、不檢討、不發言的態度是對的，反正檢討不檢討結果是一樣。黃、吳、葉、李、邱檢討多次，毛澤東表態「你們的問題在我這裏已經完了，今後就看你們的實際行動了」，中央「批陳整風」會議又通過了黃、吳、葉、李、邱的檢討，最後怎麼樣？結果不還是統統被打倒了嗎？

大陸允許如此為林彪叫好麼？允許如此牽扯到偉大領袖麼？還有李作鵬被捕當天免死狗烹的感歎，都是政治問題呵，哪家出版社敢放這樣的「毒」？同為文革人物的吳德、穆欣等大陸版回憶錄^⑮，無論客觀事實敘述還是主觀示真意願，差遠去了。

李作鵬還提供了毛澤東力挺江青的鐵證，而此前各路史料只有概述、推論，缺乏具體言證。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毛澤東南巡沿途對各地諸侯表揚江青、批評與江不睦的許世友^⑯：

毛主席說：江青直接參與的是兩次路線鬥爭，就是同劉少奇，還有陳伯達和那個人〔聽者皆知指林彪〕的鬥爭。這都是江青端出來的，她是立了大功的。……這個人頭腦清楚，我的話她是聽的，也有她自己的思想。毛主席又說：我承認江青有她的獨特的優點，她看問題很尖銳，很準確，也很認真。對劉少奇、陳伯達、林彪的錯誤，都是她首先察覺到的。這一點我應向她學習，你們也應向她學習呢。……你許世友同張國燾一樣是不對的〔指過草地時張國燾另立中央〕。要接受這個教訓，現在你對我們的感情不如過去，我的話你也不聽了。

如此挺江敲許，「夫妻一體」鐵證如山。

大陸嚴格的審讀制度之下，無論自傳還是評傳，作家除了對自己對傳主負責，還必須「對黨負責」，「不利於穩定不利於團結」的內容必須刪去。這些史實，只能從港版書刊中獲知。

通過李作鵬、邱會作回憶錄，還可清晰感觸周恩來乃毛第一助手。文革後中共力塑周恩來頂抗文革逆流，至此不戳自破。閱讀港版傳記，就像放步海灘，常常意外撿起粒粒彩貝，如周恩來幾十年將「滲透」唸成“cān”透^②。

此外，《邱會作回憶錄》中有筆者所讀到的關於長征最真實的記述^③：

軟草地上死去的人都是立着死的，有的三、五人在一起，七、八人在一起死的也不少。死去的人少數被淹沒了，多數沒有淹沒，屍體僵着，姿態各異，有的舉手在掙扎，有的和別人拉着手……這種慘狀是用生命塑造出來的。長征中期紅軍減員最多就是在軟草地上。

如此恐怖細節與「減員最多」，老紅軍回憶皆以「不宜」而隱。1944年4月，邱會作在延安中央黨校「看到過曾志被捆綁在樹上被打的〔得〕死去活來的慘狀」^④，可大陸版曾志回憶錄中則因黨性而對一年多的「搶救」淡化^⑤。邱傳中還有這樣的揭發語^⑥：

主席又有他很大的私心，他想把軍委辦事組拉在他的手上，並希望我們去遷就江青、維護江青、支持江青，為此主席多次拉黃永勝，可黃永勝不為所動，這不是說黃永勝不願意離開林彪，而是沒認識到主席的用意，毫無「悟性」。……如果毛主席拉動了黃永勝和軍委辦事組，並和江青一夥結合起來，那黨和國家的歷史就要改寫了。林彪、總理在主席那裏就像螞蟻一樣了，輕易就可以捏死。

即便紅色大佬回憶錄也有不可替代的資料性，如李鵬的「六四」邏

輯——「反黨反社會主義」乃是必須鎮壓的絕對理由，「黨與社會主義」儼然高於人民生命^⑦。他的理直氣壯恰恰幫助國人看清紅色悖謬的關鍵所在——顛倒了「主義」與人民的關係，成了人民必須為「黨和主義」服務，從而認識到何以必須政改——一個現代化國家不可能矗立在強說歪理的地基上。

眾多草根受難者的「留聲」也有非常重要的資料性。2010年，陝西七十四歲右派叔平為在香港出傳，悲壯擲言：「我已將我的房改房向銀行質押，貸了十萬人民幣。如果出書後我遭逮捕，我也不再需要住這個房子了。」^⑧押房出書且準備入獄，誠然悲壯，但也裸露叔平先生對「行情」的隔膜。像他這套文學色彩甚濃的回憶錄，「反動」色彩很低，毫無入獄「資本」，但他卻以為「反動」分貝很高。窮困閉塞、勒痕深深……寥寥數言，裸呈這位右派老人的封閉，也使人們看到中共對「右派」的終身傷害。

自傳中能否直書性愛，既是考驗傳主誠實度的試金石，也是港版傳記與大陸傳記劃然有別之處。性在人類生活中所佔比重甚大，缺少這方面交代，傳主人生便缺一大角。尤其有婚外情的傳主能否「勇敢直面」，也是衡量一部自傳真誠度的重要刻線。曹聚仁、陸鏗、康正果等在自傳中沒有迴避「出格的情」、「臨時的性」。陸鏗直寫晚年與崔蓉芝（江南遺孀）的戀情，不僅坦認喜歡女人，還向曾在獄外等候二十三年的髮妻懺悔^⑨。包天笑《鈞影樓回憶錄續篇》也招出一段豔事——北京東方飯店與西洋小妞的一夜情，嫖資百元（當時絕對砸得響的數字）^⑩。筆者邊讀邊驚，同時探知香港氛圍的寬容。如在內地，莫說「陸大

即便紅色大佬回憶錄也有不可替代的資料性，如李鵬的「六四」邏輯顛倒了「主義」與人民的關係，成了人民必須為「黨和主義」服務，從而讓國人認識到何以必須政改——一個現代化國家不可能矗立在強說歪理的地基上。

聲」憚於周邊氛圍會退縮，就是敢如此「大聲」，出版社也一定好言勸阻：這種事，怎麼可以直說直寫？給年輕人帶甚麼頭？

四 港版傳記的示範性

港版傳記規模如此宏巨，既源自香港文化界對傳記重要性的認識，也得於「客觀為他人」的商業化操作——為社會提供讀者所需要的讀物。僅僅透過港版傳記一隅，就既可領悟商業化操作的種種效益，亦能認清「西風」之所以壓倒「東風」的客觀必然。商業化儘管存在一些負弊，然其正面效益遠遠大於負弊。馬列亦說極端強調商業化負弊，實為以偏概全。港版傳記一邊向內地輸送歷史真相，一邊靜靜滴入普世人文理念——最長效的「春風秋雨」。內地客樂顛顛掏兜購書，香港出版商笑呵呵收錢，大陸文化界悄悄得益，三得其便，各受其利，還有比這更和諧的好事麼？

港版傳記的繁榮，飲水思源，得感謝最早開闢香港傳記市場的張國興（亞洲出版社社長）、黃震遐（亞洲出版社總編，大陸教材仍定反動文人）、姚立夫（香港第一本掌故雜誌《春秋》半月刊〔1957年創刊〕主持人），甚至要感謝當年撒美元的美國新聞處。近年則要感謝明報出版社、田園書屋、開放出版社、北星出版社等。筆者還要感謝寒山碧先生的「傳後」意識，當他得知筆者在研讀港版傳記，大力鼓勵，贈帶資料，推薦文章，使筆者深感「德不孤」，具體領受香港文化界的「守先待後」。

港刊及眾多香港出版社還為內地思想者提供言論平台。不僅劉曉波、余杰等異議人士時出其聲，筆者亦在

《二十一世紀》、《開放》、《爭鳴》、《動向》、《前哨》、《百家》等刊發表百餘篇「大陸不宜」之文。如筆者十年前寫的一篇評論〈終止大陸文學官辦化〉，對大陸文學官辦體制提出商榷，周遊十餘家大陸刊物，最後得載2010年6月號港刊《百家》^{③⑥}。若非港刊的鼓勵，筆者對國際共運與中國現代知識份子的研究，便不可能堅持下來。

港版傳記對內地學人還有一種示範作用：原來可以這樣寫！因長期受紅色意識形態箍勒，內地學人在「思想解放」的同時，腦海中會不時跳出一個個問號：這麼寫行不行？是不是太反動？會不會捉進去？……中共人物寫回憶錄得一路與黨性搏鬥，內心會不時產生習慣性顫抖——這兒是否撞線？那兒是否出圈？金敬邁憤言：「說清楚、說實話成了難題。……就像滿地設置些地雷似的，這裏不能說，那裏不能踩。」^{③⑦}。政治成為影響大陸傳記真實性的最大障礙。「六四」後，中共「淡化」趙紫陽，2002年出版的《薩空了文集》，年表中記載1988年10月30日薩空了追悼會，送花圈名單有楊尚昆、李鵬、萬里、李先念、胡耀邦、閻明復，唯獨沒有最高領導趙紫陽，如此小處都必須「講政治」^{③⑧}。1984年北京三聯書店版《一九五五年授銜的元帥、大將、上將》，十大元帥竟成了九位，林彪被除名^{③⑨}。

對內地學人來說，說真話是需要學習的。紅衛兵一代從小到大只會說套話假話，我們一直聽着這樣的「長輩提醒」：千萬不能寫日記，誰寫誰傻！千萬不能說真話，哪怕對自己都不能！迴避真實成了國人習慣成自然的心理定勢，不僅不會說真話、不習慣說真話，連大腦裏都不敢閃真念。筆者在港、美發表文章後，友人不斷忠告：小心粉身碎骨！敢說真話？吃

港版傳記對內地學人有一種示範作用：原來可以這樣寫！因長期受紅色意識形態箍勒，內地學人在「思想解放」的同時，腦海中會不時跳出一個個問號：這麼寫行不行？是不是太反動？

了豹子膽？看看你不算笨，原來這麼傻！在大陸，「成熟」的標誌之一就是扯謊能夠臉不改色、心不跳。

五 多元放射性價值

個人傳記有着綜述性史書無法替代的史料作用，逝去的歲月還原為可感可觸、喘着粗氣的血肉生活，向後人提供了很難憑其經驗拼製勾勒的昔日實況。尤其完全違背人性之常的紅色歲月，當代青年已很難想像當年的悖謬。1961年，三十歲的北大右派萬耀球（從母姓）發配北京製藥廠，只發生活費18元，要與工資也只有18元的女徒工結婚，向父親國務院參事李奇中（黃埔一期生、國府少將）借款80元購置牀桌生活必需品。七級高幹的父親月薪200多元，答曰：「你得罪共產黨，把你劃為右派。改造你們的思想，只給十八元一月，是共產黨愛護你們，只有艱苦才有利於改造。我一分錢都不能給你。給你錢，就是向共產黨唱對台戲，不利於你們的改造。……你是右派，應該全心全意改造自己，根本不應該考慮結婚。」聽兒子說每天餓得難受與各地農村餓死許多人，這位國務院參事再答：「你說這些話，說明你思想還是沒改造好。中國人餓，是自己肚子太大，吃得太多，只能怪自己。一頓吃半斤八兩糧食，吃太多了。外國人一頓飯只吃很薄一、兩片麪包，我一餐一小碗就夠〔萬父不勞動，又有保證高幹的每日牛奶和副食〕。」^④這樣的「毛時代」寫真，今人已無法憑經驗想像了。

再如邱會作既認同為劉少奇平反，又認為「在宣傳上打擊了毛主席」，甚至認為「劉鄧路線」才引起毛

發動文革，「階級立場」一語了然^⑤。如此矛盾心態與悖謬言論凝為毛時代人物的獨特標本，也是二十世紀國史一景，實在是一個時代「製作」一個時代的人物。

據說2011年夏，美國新任駐華大使駱家輝上任前接受《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 記者採訪，駱大使說為了解中國，他讀了兩本書，一本是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新書《論中國》(On China) (宏觀)，一本即康正果《我的反動自述，1949-2003》(微觀)。港刊文章甚至還有平反冤案之「神力」。王凡西《雙山回憶錄》與後來一篇更正文章，成為王實味「托派」冤案平反受阻與最終得雪的唯一證據，來來回回竟全靠香港資訊^⑥。

除了揭示真相，港版傳記還有一項令中共更皺眉的功能——「顏色滲透」。大陸人民讀港版傳記會覺悟覺醒，滋生出麻煩的獨立意識，愈來愈不聽話不順從了。譬如筆者，「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2005年赴港訪學前無緣接觸任何「反動宣傳品」，兩度赴港訪學不過50天，讀了幾本港版傳記，50年「黨的教育」搭建起來的紅色意識形態，轟然坍塌，開始向港、美投稿，「轉彎子」之大，如今鏡子裏都不認識自己了：從大饑荒、反右、文革、延安、江西、上海……文學教授竟一門心思研究起中共黨史，得到官家的「特別關注」。

六 港版傳記生態之不足

港版傳記欠缺的是史評。述史容易評史難，非有相當史學素養不能為也。傳記作家層次紛雜，有經歷而無史識者眾，有史識兼有史筆者則寡之又寡。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Pierre

個人傳記有着綜述性史書無法替代的史料作用，逝去的歲月還原為可感可觸、喘着粗氣的血肉生活，向後人提供了很難憑其經驗拼製勾勒的昔日實況。當代青年已很難想像當年紅色歲月的悖謬。

Bourdieu) 說：「自傳經常是自己為自己立墓，而且是立衣冠塚的一種方式。」^④一般只埋鮮衣不埋肉身，自我昇華。盧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的《懺悔錄》(Les Confessions) 竟稱：「萬能的上帝啊！……讓他們每一個人在您的寶座前面，同樣真誠地披露自己的心靈，看看有誰敢於對您說：『我比這個人好！』」^⑤針對傳記中虛報冒領、攬功諉過、自塑英姿等人性弱點，香港文化界的監督批評力度甚小。就像市場需要監督管理一樣，傳記也需要監督，需有「陸大聲」這樣的人直戳其虛。香港傳記雖多，欠缺必要評鑑專欄與傳評作家。

自傳一般濃墨重彩「過五關」，淡寫避寫「走麥城」。聶元梓對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候補中央委員一節，只敘周恩來提名，不提預選未過半數票，毛澤東專門做了工作，她才以「造反第一人」當選^⑥。「九·一三」事件後吳法憲沉不住氣，不與軍委辦事組同事同坐，張春橋問幾句飛行常識，吳每次起立回答以示恭敬，遭張嘲笑：「沒有林彪，你總不至於活不下去吧？」如此生動細節，《吳法憲回憶錄》中未着一字。還有吳法憲在高壓逼誘之下提供假證，承認葉群向他布置政變，傷及萬餘涉案者。1980年公審前夕，官方宣布此證為假，吳在秦城監獄當面向邱會作道歉。如此重大污點，吳在回憶錄中盡量淡化^⑦。曹聚仁自傳《我與我的世界》，對其中共文化線人身份^⑧，遮遮掩掩，終身為黨守密，多處圓謊，有悖常理。

錢鍾書甚至極而言之：「自傳不可信，相識回憶亦不可信，古來正史野史均作如是觀。」^⑨讀傳如聽審，兼聽則明，切不可偏聽一家之言。傳記研家，貴在辨析，工作量巨甚。

內地的政治封禁，成就了港版傳記的繁榮，尤其領袖級人物的傳記，如內地缺失的毛傳鄧傳，頻頻成為香港叫座的題材，以致出現一些魚目混珠的著作。如出格甚顯的張戎夫婦寫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筆者曾抱極大閱讀期待，然僅閱三分之一，只能擱棄。該書竟說蔣介石與斯大林做交易，斯大林不殺蔣經國，蔣介石則不滅南方紅軍，只將他們從富庶的江南趕到陝北僻地「關」起來；1933年蔣就派親共的邵力子執掌陝政，專候各地紅軍。此後，第五次圍剿便是將紅軍趕到鋪設以待的陝北，「蔣介石放走共產黨」^⑩。天翻地覆且悖違常理的長征之說，論據竟是不能證明論點的蔣氏父子的一二則日記，無風捉影，生拉硬扯，且全書無註！作家撰史常常想像大於考證，但張戎夫婦如此「驚天動地」，令人跌破眼鏡，後雖再出註釋本，筆者已不願再為這種「大膽假設」之書耗誤時間。

真實為傳記生命線，傳記寫成小說乃大忌。巫寧坤自傳《一滴淚》(A Single Tear: A Family's Persecution, Love, and Endurance in Communist China, 1993年英文初版) 真實可信，不誇大不虛構，史料價值極高，成為1950年代海外投歸者(謔稱「自投羅網」)的真實留蹤。巫女一毛則將自傳《暴風雨中一羽毛：動亂中失去的童年》(Feather in the Storm: A Childhood Lost in Chaos, 2006年英文初版) 寫成小說。巫氏父女所敘同一事件，「老螃蟹」在父傳中活至文革後，抱怨改革開放使他失去昔日威風；巫女傳中「老螃蟹」則在文革中死於仇家，且被倒插糞坑。再如「小兔子」之死，父女敘述也不一，其他一些細節(如「老螃蟹」霸佔巫家木牀)亦出入甚大^⑪。

針對傳記中虛報冒領、攬功諉過、自塑英姿等人性弱點，香港文化界的監督批評力度甚小。就像市場需要監督管理一樣，傳記也需要監督。香港傳記雖多，欠缺必要評鑑專欄與傳評作家。

以筆者讀傳心得，各路傳記不僅體現相應時代的特定風貌、反映特定社會問題，且含特定思維方式、價值取向、審美標準、共同性格等重要資訊。後人既能從細節處察辨史迹，亦能從中把握史脈。

巫女之傳雖有一定真實性，可幾處虛構細節破壞了全書誠信度，得不償失。

當然，大陸傳記虛假作秀成份更多。章含之將喬冠華文革後期的政治大跌宕，說成天大地大的大冤枉：「1976年的冤屈，他終於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喬冠華病逝於1983年，以高幹身份得一流醫護，天天能喝西洋參湯^⑤。章含之將自己的命運寫得淒淒慘慘戚戚，符合那一段國情麼？更重要的是：章含之隱去喬冠華的文革劣迹，虛寫其悲，避寫其實。文革後，外交部在崇文門外北京體育館舉行揭批喬章夫婦大會，黃華主持，外交部系統數千人參加，環坐看台，夫婦倆獨坐場中一長凳^⑥。如此「黑色幽默」的大場面，痛心徹骨的挨批經歷，何以不着一字？2004年，張穎（章文晉之妻）撰文出示喬冠華上江青之船的證據^⑦。

七 展望與寄語

傳記售假，防不勝防，需耗大量時間精力辨偽，因此須設批評雄關，及時辨偽剔謬指假戳虛，形成制約性社會壓力。社會不僅需要扶持傳記寫作，亦需扶持制約造假的批評類刊物，合成必要的社會震懾，提高售假者的「犯罪成本」，預防勝於治療呵！

傳記的真實性不僅涉及歷史真實，還事關國民誠信。倡真打假，才能留住真實，消滅虛假。需要總是先行於滿足，就像我們需要自由，國家才有可能建立保障自由的制度。

與其他文化項目相比，兩岸三地對傳記的關注度甚低，傳記研究亦難成陣伍（儘管均有「傳記文學研究會」），亦未有一本輔導傳記寫作的「教材」，

絕大多數傳記寫作處於「自在」的粗放型低水準，許多精彩的人生故事與重大細節隨風飄去，沒於史塵。如何提高傳記寫作水準（其實關乎重視個體生命質量），需要社會撥投一定關注。

較之大陸，香港終究還有寒山碧這樣的傳記研究方家，捧出厚厚兩本專著——《香港傳記文學發展史》、《香港傳記文學發展特色及其影響（香港傳記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⑧。大陸則連「真實」都還尚未接受、不敢接受，真正的傳記研究又如何開張？筆者多次欲申報這一課題，一想到「幾無可能」，自己就先「槍斃」了。

以筆者讀傳心得，傳記研究實為一頃甚值開拓的沃土。各路傳記不僅體現相應時代的特定風貌、反映特定社會問題，且含特定思維方式、價值取向、審美標準、共同性格等重要資訊。後人既能從細節處察辨史迹，亦能從中把握史脈。

隨着社會發展，傳記的閱讀需求會一路走高。2003年，希拉里（Hillary Clinton）回憶錄一周銷出60萬冊；2004年，克林頓（William J. Clinton）回憶錄初版150萬冊，供不應求，預付版稅1,000萬美元^⑨。這種文化盛事估計也會在中國出現。畢竟，真實有着最值得關注的綜合價值。一部真實且具歷史穿透力的傳記（如蔣夢麟的《西潮》），對中老年人的閱讀誘惑遠遠超過任何虛構的小說。1987年9月31日，胡耀邦在購閱吳清源、陳祖德的傳記後，寫下一段話：「我一直認為，看看各類名家傳記性的小冊子比看那些水準不高的文藝作品或電影電視片，得益更多。要幫助青少年特別注意這一點。」^⑩近年，內地客訪港歸來，向親友送上一套港版傳記已成為上佳贈品。

註釋

① 龔楚：《龔楚將軍回憶錄》（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司馬璐：《鬥爭十八年》（香港：亞洲出版社，1952）。

② 黃藥眠：《動蕩：我所經歷的半個世紀》（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胡績偉：《青春歲月：胡績偉自述》（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

③ 徐向前：《歷史的回顧》（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

④ 灰娃：《我額頭青枝綠葉——灰娃自述》（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香港：天行健出版社，2011）。

⑤ 胡適：〈傳記文學〉（1953年1月12日），載俞吾金編選：《疑古與開新——胡適文選》（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頁123。

⑥ 胡適：〈四十自述·自序〉，載海星編：《四十自述》（深圳：海天出版社，1992），頁4。

⑦ 曹聚仁：《魯迅評傳》（香港：香港新文化出版社，1961），頁99、149。

⑧ 參見韓文甫：《鄧小平傳》（香港：東西文化事業公司，1994）。

⑨ 戴煌：《九死一生——我的「右派」歷程》（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篇首圖片31。

⑩ 葉永烈：〈香港與大陸傳記文學的比較〉，載寒山碧主編：《香港傳記文學發展特色及其影響（香港傳記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香港：東西文化事業公司，2000），頁257。

⑪ 趙家梁、張曉霽：《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香港：大風出版社，2008）。

⑫ 宋永毅主編：《文革大屠殺》（香港：開放雜誌社，2002）。

⑬ 馮蘭瑞：《別有人間行路難：1980年代前後中國思想理論風雲及其他》（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頁56-69。

⑭⑮⑯⑰⑱ 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上冊（香港：新世紀出版及傳媒有限公司，2011），頁393-438、382；369；74；124；447、449。

⑲ 烏蘇里：〈蒯大富公開吹捧毛讚美文革〉，《開放》，2011年6月號，頁11。

⑳ 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香港：大華出版社，1971）；張國燾：《我的回憶》（香港：明報月刊社，1971）；王凡西：《雙山回憶錄》（香港：周記行，1977）；許家屯：《許家屯香港回憶錄》（香港：香港聯合報有限公司，1993）；康正果：《我的反動自述，1949-2003》（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2004）；賈植芳：《獄裏獄外》（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1）；張元勳：《北大一九五七》（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2004）；何方著，邢小群錄音整理：《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何方自述》（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2007）；李南央著，王若水等評述：《我有這樣一個母親》（香港：開放雜誌社，2003）；譚蟬雪：《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記實》（香港：香港天馬出版有限公司，2010）。

㉑ 陸鏗：《陸鏗回憶與懺悔錄》（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巫寧坤：《一滴淚》（台北：遠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2）；胡適口述，唐德剛譯註：《胡適口述自傳》（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張學良口述，唐德剛撰寫：《張學良口述歷史》（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

㉒ 賈植芳：《獄裏獄外》，頁131-33。

㉓ 葉永烈編著：《江青畫傳》（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8），頁21。

㉔ 龔楚：《龔楚將軍回憶錄》，上卷，頁208-209。

㉕②②③ 李作鵬：《李作鵬回憶錄》，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頁739；681；760、743、687。

㉖ 周素子：《右派情蹤：七十二賢人婚姻故事》（香港：田園書屋，2008），頁226。

㉗ 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穆欣：《辦〈光明日報〉十年自述：1957-1967》（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

㉘ 何方著，邢小群錄音整理：《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上冊，頁241、244。

- ⑩ 曾志：《百戰歸來認此身——曾志回憶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頁259。
- ⑪ 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下冊，頁955。
- ⑫ 吳國光：〈導言〉，載李鵬：《李鵬六四日記——原擬定名〈關鍵時刻〉》，www.newcenturymc.com/Li%20Peng%20Tiananmen%20Diary.html。該書2010年原定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出版，後因「版權問題」擱置。
- ⑬ 武宜三：〈這是最後的鬥爭，也是最後的犧牲！——序叔平先生《秋望三部曲》〉，載叔平：《秋望》，第二部，〈生死煎熬〉（香港：五七學社出版公司，2010），頁8。
- ⑭ 陸鏗：《陸鏗回憶與懺悔錄》，頁529-44。
- ⑮ 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續篇》（香港：大華出版社，1973），頁144-46。
- ⑯ 裴毅然：〈終止大陸文學官辦化〉，《百家》，第8期（2010年6月15日），頁82-85。
- ⑰ 金敬邁：〈本書及其握管人——《歐陽海之歌》1997年再版前言〉，載《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哪》（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4）。
- ⑱ 祝均宙、蕭斌如編：《薩空了文集》（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2），頁430-31。
- ⑲ 王曉鐘編：《一九五五年授銜的元帥、大將、上將》（北京：三聯書店，1984）。
- ⑳ 萬耀球：《滾爬血腥路——憶我賤民·平民人生》（香港：五七出版公司，2009），頁12、273-74、269。
- ㉑ 王凡西：《雙山回憶錄》，頁278；〈談王實味與「王實味問題」〉，《九十年代》，1985年5月號，頁80-88。
- ㉒ 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著，包亞明譯：《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布爾迪厄訪談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頁55。
- ㉓ 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著，黎星、范希衡譯：《懺悔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頁3-4。
- ㉔ 聶元梓：《文革「五大領袖」：聶元梓回憶錄》（香港：時代國際出版

- 有限公司，2005），頁319-22；程光：《心靈的對話：邱會作與兒子談文化大革命》，上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頁242。
- ㉕ 程光：《心靈的對話》，下冊，頁633、784、859-60；再參見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07），頁934。
- ㉖ 參見鍾瑾：〈就讓你依靠〉，《文摘報》（北京），2011年6月28日，第8版。原載《新民週刊》（上海），2011年第23期。
- ㉗ 錢鍾書1979年6月4日給老友黃裳的信。參見孔慶茂：《錢鍾書傳》（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2），頁225。原載黃裳：《榆下說書》（北京：三聯書店，1982）。
- ㉘ 張戎、哈利戴(Jon Halliday)著，張戎譯：《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香港：開放出版社，2006），頁115-17。
- ㉙ 巫寧坤：《一滴淚》，頁417、350；巫一毛：《暴風雨中一羽毛：動亂中失去的童年》（香港：明報出版有限公司，2007），頁256、188-89。
- ㉚ 章含之：《跨過厚厚的大紅門》（上海：文匯出版社，2002），頁82、191；《風雨情——憶父親、憶主席、憶冠華》（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4），頁267。
- ㉛ 何方著，邢小群錄音整理：《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何方自述》，下冊，頁522。
- ㉜ 張穎：〈故友二人行——懷念龔澎並憶喬冠華（下）〉，《百年潮》，2004年第6期，頁21-22。
- ㉝ 寒山碧：《香港傳記文學發展史》（香港：東西文化事業公司，2003）；《香港傳記文學發展特色及其影響》（香港傳記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㉞ 金鐘：〈紅色回憶錄史話〉，《開放》，2007年3月號，頁40。
- ㉟ 陳祖德：《超越自我：我的黑白世界》（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頁首影印件。

裴毅然 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復旦文學博士。